

# 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 ——以美国华人移民家庭为例<sup>①</sup>

周 敏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和亚裔研究学系,美国 洛杉矶 90095)

**摘 要** 在美国,许多华人移民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和品行要求很严,期望他们日后事业有成,帮助家庭发财致富,并为父母养老送终。然而,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维护中华传统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执行此类家教并非易事。原因是父母为外来移民,而子女则在美国本土生长,两代人同化的取向和速度都不同。家中不仅充满任何家庭中常见的父子两代的代际冲突,也充满移民家庭特有的跨文化冲突。本文研究了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问题,着重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家庭关系以及移民父母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 海外华人 移民家庭 代际关系 跨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D5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2)02-0025-09

在 21 世纪的美国,华人移民的家庭结构大多是双亲核心家庭。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单亲家庭的比例近年来虽有上升的趋势,但也不多见。在华人移民家庭里,儒家传统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被用作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少华人移民父母说自己漂洋过海、含辛茹苦、日夜劳累是为了子女能够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出人头地。他们不仅希望子女成龙成凤,还期望他们帮助家庭发财致富,为父母养老送终。没出息的子女会令家人蒙羞。

然而,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维护中华传统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执行此类家教并非易事。原因是,父母为外来移民,而子女则在美国本土生长,两代人同化的取向和速度都不同。家中不仅充满任何家庭中常见的父子两代的代际冲突,也充满移民家庭特有的跨文化冲突。华人移民家庭子女时刻同时处于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避之犹恐不及的华夏文化,及趋之若鹜的美国文化。子女常视父母为“老顽固”,父母之道为“老封建”、“老过时”、“老落后”。子女的反叛亦是脚踏两种文化的产物。而父母则视严格家教为教子成龙的良方。父母常常担忧子女过于美国化,担忧子女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以

自我为中心。也不喜欢子女目无尊长,与大人顶撞或论理。此外,当今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社会地位高低不等,居住环境分散。有的住在市区内的老唐人街,有的住在华人聚居的郊区,有的住在中上阶层的白人区,还有的住在种族混杂的低层市区。各式各样的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制约着华人家庭的代际关系。本文旨在研究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问题。着重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家庭关系以及移民父母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 一、新老华裔第二代的区别

华裔美国人是美国历史最长和最大的亚裔群体。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定居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这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包括长达 60 年的排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排华法的废除及 1965 年移民法案的通过以及后来一系列宽松的移民立法,使华人移民美国的人数以十多倍的速度增长:从 1960 年的 24 万人到 1990 年的 160 多万人,再到 2010 年的 380 多万人(包括 40 多万混血儿)。华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移民。据美国移民

收稿日期:2012-05-13

作者简介:周敏(1956—),女,广东中山人,教授,从事移民社会学研究。

<sup>①</sup>本文的实证资料来源于笔者 1995~2001 年在洛杉矶和纽约华人移民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个人访谈和实地观察。部分内容曾刊于《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周敏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局统计,从1960~2009年的50年间,美国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共接收了200多万移民。自1980年以来,中国一直雄居美国十大移民来源国之列。美国的人口普查亦展现国际移民潮的巨大冲击。目前,美国华裔人口约2/3以上为国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36%是在2000年后移民美国的),而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第二代(父母在国外出生)约占1/5,在美国本土出生(父母也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第三代则占不到1/10。现在大多数第二、三代华裔是尚未成年的、正在移民家庭里成长的青少年儿童。

### 1.“老”华裔第二代

“老”华裔第二代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移民潮来临之前在美国本土出生、在移民家庭成长的华裔青少年。大量史实表明,最早的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四邑地区。其中多为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出洋寻求金山梦的青壮年男子,他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在美国定居,而是想挣钱发财,衣锦还乡。他们初到美国时大多在矿上做苦工。后来被招募去修建横贯美国东西大铁路中洛基山以西最困难的一段铁路,为开发美国西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铁路竣工后,华工却成为白人工会和地方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sup>[1-3]</sup>。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难更为反华气焰火上加油,导致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迫使华人退缩在美国主流社会边缘的夹缝中求生,在美国旧金山(又称三藩市)、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了唐人街并聚居于这些与世隔绝的族裔孤岛。华人移民只能依靠互助和族裔社区组织的支持。他们的交往十分密切频繁,但大多限于唐人街内各种社区组织,如同乡会、公所、堂口及商会等。人际关系也大多限于同宗、同族、同乡和亲朋好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

美国的排华移民政策和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以及华人社区内部“证书儿子”(paper sons)<sup>①</sup>等男性非法移民的涌入,导致了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内女少男多,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890年,美国华裔男女比例是27:1,1910年降到9:1,尽管后来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但20世纪40年代华裔人口的男女比例仍超过2:1。在那时的唐人街里,很少见到妇女和儿童,正常的双亲核心家庭寥寥无几。故此,唐人街又被称作“单身汉社会”。严厉的排华法案严重地影响了华人移民生儿育女的自然繁衍,极大地限制了华人正常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华裔第二代的人数很少。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口占华人总人口的不到

9%。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裔第二代逐渐形成。但至二战爆发时还年纪尚轻。唐人街内年幼的华裔第二代与年迈的华裔第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排华法案直至1943年才撤销。但是华人移民还继续受国家定额的移民法的限制。1943年~1968年,年度华人移民限额仅为105名。由于移民受限,美国土生的华人比例逐渐增大。至1930年,美国土生华人已占美国华人人口的41%。当时华裔学童与其他非白人少数族裔学童一样,不准入白人公立学校读书。即使受过教育,也很难在主流社会中谋取与学历相当的职业。

排华法案废除后,美国放宽了华人妇女移民入境,她们大多数以“军人家属”或“军队新娘”的身份入境。二战中及二战后,还有数以万计华人难民及难民家庭从中国内地经香港和台湾逃至美国,由此使华人正常的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大。1960年,美国土生的华裔比例升至60%以上。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土生华人人数量超过华人移民人数。老华裔第二代的特点是:父母多为移民,本人大多生长在唐人街,熟谙华语,但深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之困扰和伤害。

### 2.“新”华裔第二代

“新”华裔第二代是指父母在60年代以后才移民美国的、在美国出生或成长的第二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人人口稳步增长。至1960年,老华裔第二代已大多成年,唐人街也以土生的年轻人和老华侨居多。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案,废除了根据移民来源国所设的定量配额制度,给予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以优先权,使大量亚裔移民,包括华裔移民涌入美国。从1960年代末开始的华人移民潮日益高涨,近三十多年来有增无减,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华人社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960年代是华人社区发展和华裔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华人社区不仅发生了巨大的量变,也发生了巨大的质变。1960~2010年,美国华人人口增长了15倍。华人社区迅速从过去的“单身汉社会”变革为以移民家庭为主、性别平衡的族裔社区。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是华人社区呈现出多元化的新局面。多元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来源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定居模式和不同社会流动途径等方面。

当代美国华人移民的来源地较早年华人移民的来源地更加多样化。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华南的四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当代华人移民则不仅来自中国内地的各个省份,而且还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世

①指冒充美国公民儿子身份、持公民证书入境的非法移民。

界各地华人社区,如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南美洲。比如,洛杉矶大都会地区的华人约有1/4生于美国,30%生于中国内地,20%生于台湾,8%生于香港,其余的20%左右生于其他国家与地区。来源和出生地的不同导致了语言文化的差异。当代华人移民方言种类繁多。华人使用统一的汉语书面语,仅有繁体字与简体字之分。但口语方言则多如牛毛:广东话、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上海话等,彼此互不相通。

当代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早年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大不相同。他们有些人来自乡下,目不识丁,技能低下,身无分文,只能栖身陋室,当牛作马。有些人则知书识理,身怀技能,一到美国便能很快靠自己的本事打入主流社会。还有些人家财丰厚,一到美国便能置房置业,当起大小老板。一般说来,当今美国华人的教育水准、职业状况和家庭收入中位数都远高于美国全国的平均水平。2009年美国人口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美国25岁以上的成年人口中,有大学4年本科以上学历的占28%,而华人则占51%(26%学士学位,25%硕士和博士学位)。美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管理技术白领职位的占36%,而华人占53%。2010年全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中位数)是61000美元左右,而同期华人家庭年平均收入达到78000美元。

当代华人移民的定居模式亦较以前大为不同。当今华人的定居模式各式各样,聚居与散居并存。聚居多沿历史传统居于美国西海岸及各城市。美国华人约有37%定居加州,17%定居纽约州。历史上华人甚少的州,如今亦看到华人空前地移入,如德克萨斯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在人口10万以上大城市中,纽约市的华人人数最多(49万人),旧金山第二(17万人),洛杉矶市(7万)第三。洛杉矶郊区小城镇及旧金山附近小城镇,华人比例亦很高。在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大城市内,老唐人街仍继续存在,并继续接收新移民,但已不是新移民落脚的主要地点了。教育水准高且富裕的白领阶层新移民大多绕过唐人街而直接落脚郊区。目前,在洛杉矶市和纽约市的华人中,仅有10%住在老唐人街,而旧金山的华人仅有8%住在老唐人街,超过半数的华人住在郊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族裔聚居区在中产阶级的郊区不断出现,体现了当代移民定居新特点。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记录,美国有13个华人人口占城市人口的1/5以上,其中11个是洛杉矶大都市的卫星城镇,这些城市又称为华人聚居郊区<sup>[4]</sup>。这种多元化

的定居模式为当代美国华人移民及其下一代创造了多元化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传统的老唐人街,华人移民聚居郊区和白人郊区。与老华裔第二代相比,新华裔第二代在多元环境中成长,他们大多不懂华语,较少直接受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切身危害。华人移民家庭在与不同传统、不同文化环境和居住环境以及不同族裔群体的互动中生存,也自然面临不同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下面将详谈华人移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常碰到的一些主要问题。

## 二、华人家庭面临的新问题

在美国排华移民政策实施期间,大多数华人被困于唐人街的“单身汉社会”。许多华人“单身汉”其实已婚,但不得不把妻儿父母留在大陆乡下。唐人街内少数的“正常”家庭,多为商人家庭,还有一些帮工的家庭。这些帮工多是以“商业合伙人”身份移民美国。在老唐人街中,不论个人或是家庭,与华人社区的各种组织关系密切,几乎不能离开这些社区组织而生存,对社区即依赖又受控。老唐人街像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成长的小孩,不仅直接受到自己父母的管教,还身不由己地受到社区内“爷爷”、“叔伯”的管教。这些“爷爷”、“叔伯”并非亲爷爷、亲叔伯,而是同族(同姓)的长辈或父母的亲朋。子女和父母的言行均受华人社区的制约。孩子们要么就是“乖仔乖女”;有出息,要么就是“败家子”;没出息。孩子们操流利的汉语方言,读中文学校,在华人经营的商店和企业里打工,社交圈被限制于华人社区内。因此,许多华裔子女更希望自己是白人,能像白人孩子一样自由自在、毫无约束地成长。然而,他们却不被以白人为主流社会所认同,在唐人街里也常被父辈看成是中西文化都不通的“竹升”(广东方言意为竹子),不为华人社区所接受。主流社会蔑视华人,将他们拒之千里,在学校、工作地以及社会上设立重重障碍进行种族隔离。华人的父母别无选择,不但自己要待在唐人街,也不得不让子女也待在那里,使其子女不受种族歧视的直接伤害。这样一来,两代人被迫在唐人街的狭小族裔圈子里发展,其互动交往的范围局限于华人自己的组织和社区机构以及自己的同胞。华人中文学校成为华人社区机构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结果,尽管华裔青少年与白人家庭的孩子们一样,有反叛倾向,也有两代的隔阂,华裔青少年最终还是发现,转来转去还是转不出唐人街,还是要回到华人社区。再反叛捣蛋,自己仍是华人而成不了美国人。

老华裔第二代的成长处处受限制,他们不为当

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所容,无自由选择住处、学校和职业的权利。新华裔第二代的成长虽然仍受家庭文化传统、经济地位和居住环境的制约,但是主流社会的大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宽容,许多种族歧视的立法和做法已逐渐被取缔,社会已基本不再敌视或排斥华人。仍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多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缺乏劳动技能的新移民。他们只能先在唐人街立足,依靠唐人街的社区资源为生。他们操流利的汉语,主要与其他华人来往,并积极参与唐人街的各种社团活动。尽管他们的子女仍大多就读于华人移民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子弟为主的学校,他们已有机会与非华人子弟来往,在大社会中拼搏,有比较自由的选择。但由于出身低微,成长环境又受社会分层等级制度的制约,他们所接触的所谓大社会其实是贫民社会,所接触的人其实大多是低下层的少数族裔成员,就读于质量较差的城内公立学校。因此,唐人街的子弟较中产阶级的子弟更容易陷入终身贫困,因为地位低下而自然地融入美国社会的底层<sup>[5]</sup>。

与之唐人街相比,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的居民多为中上阶层的华人,偶有少数下层(低收入)的华人。华人子弟大多与中上阶层的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往,多就读于郊区公立学校。此类学校虽仍是以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子弟为主,但比起城内学校质量要好得多。郊外的华人聚居区中还有各种华人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支持华人子弟的教育,如中文学校、课后补习班、尖子班、大学考试和学前辅导班以及各类体育活动和音乐文艺活动。这些华人子弟也能讲流利的汉语,与其他华人来往密切,并参与华人社区和文化活动,如烹饪、音乐、节庆等。但他们与其他族裔也密切来往。

居住在中产阶级白人郊区的华人移民子弟,父母多为高学历、高职业、高收入、中英文双语流利的高度同化者。那里的华人子弟大多就读于以白人为主的学校,与华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来往甚少,朋友亦多为白人。他们主要操英语(在家中亦然),虽然也上中文学校,但汉语水平甚低。

总而言之,新第二代比老第二代生活在更开放、宽容、有利的大社会环境中。新第二代子女不再面临阻碍读书求职的排华法的障碍。他们生活在正常的家庭和社区,享有更多的社会福利,不再局限于华人社会。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成为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本钱去“反叛”和“造反”。例如,他们动辄以“告官”;“报警”来威胁把“送父母送入监狱”。因为按照美国法律,父母如打骂子女则可因虐待儿童而定罪。主流社会的规范、

机构和法律制度支持他们这样做。一旦离家出走,他们也能活下去。然而,华人移民父母认为在开放社会中比在唐人街内更难管教子女,因为除了自然的代际冲突,父母所属的移民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中西文化的冲突更加剧烈。

当代华人移民抵达美国后一般面临以下几个主要的困境:困境之一是家庭结构及其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剧变。在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华人家庭通常是大家庭,三代同堂或与其他亲戚同住是常见的现象。即使不同住也来往密切。抵美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都一下子中断了。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互助功能,管教和约束子女的功能亦大为减弱。过去,华人移民大多有乡亲朋友的密切关系,他们移民抵美后仍聚居在一起。所以在唐人街内不难重建亲友社会关系网。如今,华人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即使同乡同方言,也可能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的背景而形同路人,互不往来。不少新移民还受环境不熟,文化不通,不懂英语,无学历,无技能等不利因素的困扰,安身立足非常困难。早年的移民抵美后,可以在唐人街投亲靠友。但新移民即便在唐人街安身,与街坊邻里之间仍往往是同族陌生人,并非亲友。住在唐人街里的新移民虽然人际关系多是肤浅的功利关系,而非密切的亲情友情,他们对自己所属的华裔社区和文化的认同程度高,族裔群体意识和华人文化意识相对较强。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的新华人移民的散居模式,更令华人家庭与华人社会的距离拉大,难以重建因移民而断裂的亲友社会关系,很难与华人和华人文化保持联系。此外,比起低下层的华人家庭,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并不需要通过与华人社区保持密切联系,来寻求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但是,他们仍对华人社区有不同程度的文化需求。

困境之二是家庭关系及其内部环境的剧变。大部分华人移民家庭是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都工作,有些还打几份工,甚至日夜倒班。新移民常常被迫做收入低下的工作。教育水平虽高但不懂英语的新移民也如此。很多新移民家庭无法只靠一份收入来维持。许多男人不能独立养家,因而妻子也被迫出外打工,还要生养孩子。这就使得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了微妙变化。譬如,妇女出外打工,可是家里又没有祖父母或可依赖的亲戚朋友照看年幼的孩子。于是年幼孩子们便成“钥匙孩子”(脖子挂着家钥匙),课后单独在家。在美国,13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成年人看管,政府可以虐待儿童来治父母的罪。父母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十分少,因此而影响大人与孩子的沟通。另外,父母与子女关系在新环

境中,尤其是在父母不懂英语的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例如,父母不懂英文,而孩子的英文很快进步。在与外界交流和处理家务事(如付账单等)的时候,常常需要靠子女来翻译,孩子常常变成小大人,这种角色使得父母的权威大打折扣。

困境之三是“代沟”加深。移民家庭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一致的文化同化步调使“代沟”加深。移民父母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子女之间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语言文化的差距,“代沟”就更为明显。以“美国梦”的定义为例,大多数成年新移民、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新移民日夜忙着打工,养家糊口,很难有空考虑自己和本人日后如何出人头地。他们对“美国梦”的定义是:住自己的房子,自己当老板,送孩子进名校。他们虽然也努力企求打入主流社会,但为的只是这三大目标。而子女们则更为雄心勃勃。他们不仅追求有形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更要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成为与众人一样的、不受歧视的美国人。借用洛杉矶一个土生华人高中生的话来说,就是:“穿戴够酷,去看球赛,吃汉堡薯条,全家外出度假,开心享乐,随心所欲,不用受父母管教约束,那才是最酷的”。

父母子女之间的文化鸿沟致使代沟加深。子女常视移民父母为“老顽固”。视父母之道为过时守旧“老封建”的那一套,有的小孩还故意与父母对着干。父母每天因打工和忙于家务而筋疲力尽,还要为子女担心。他们为子女有太多的自由,从学校、街上和电视上学到太多不好的东西、太顽皮捣蛋、太不服管教而发愁。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子女在一起,更难与已经美国化的子女进行沟通,也不太会协调父母的期望和子女的需求。结果使本来已经紧张的父母子女关系火上加油,使子女与父母逐渐疏远,进一步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更糟糕的是,在移民来源地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父母管教子女的方法,在接收地却被视为过时、甚至违法。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父母的权威。

文化鸿沟亦影响到在外国出生的青少年和美国土生的青少年的关系。许多移民小孩的青少年生长期大部分时光是在来源国度过的,那里与美国的语言文化,尤其是青少年文化和朋友圈大不相同。在来源国,他们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时髦”,什么是“酷”,什么是“流行”,他们大多在校成绩平平,却也能心高气傲,信心十足。来到美国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成了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被人嘲笑愚弄的靶子,还常被土生华人孩子或学龄前就移民来美的华

人小孩贬称作“刚到岸的土佬”<sup>[67]</sup>。在学校亦处境困难。因语言文化不适应,他们表达困难,常被老师和同学误解。常因长相,口音,服饰而被嘲讽和骚扰,但又不敢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忧。由于他们在学校和家里都感到孤立和无助,因此变得情绪低下,甚至变得兴趣缺乏,成绩下降,最终辍学,加入帮派。一社区领袖指出:“有时当个帮派分子比当个学生要容易得多。老师、同学、父母都视他们‘不中用’;没出息’。他们渴望被人理解。而在校在家也又感到压力巨大却又无助无奈,感到不舒服,被排斥。进了帮派就不同,他们可以占据街头,感到压力全无,彻底解放,自由自在,随心所欲,重拾自我,重振信心。”

这几类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在其他族裔的移民家庭中也屡见不鲜,且相当严重。对在美国打拼的父母及子女有深远的影响。下面笔者将重点探讨代际冲突中几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以及父母和子女如何相互沟通和解。

### 三、横跨两个社会文化世界:冲突与和解

当今美国华裔的第二代年纪尚轻,开始大批迈入青壮年。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美国土生华人中,0~17岁的占44%,18~24岁占10%,25岁以上的占不到一半。与父母不同,移民的子女与父母亲的祖国并没有太多的切身生活经验,也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更谈不上深厚的感情。他们大多认同于自己的出生国或生长国<sup>[89]</sup>。然而,成长于移民家庭之中,子女时刻感到身处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这是华人移民家庭代际冲突根本原因之一。

中华文化中,孝敬是父子关系之原则<sup>[10]</sup>。但此准则多要求子女孝敬父母而非父母与子女相互尊重。子女被认为有欠于父母,从而孝敬父母乃天经地义。子女须压抑自身利益,无论父母的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都要尽力满足父母的需要<sup>[11]</sup>。除了“孝顺”,还要“服从”,即无条件顺从或屈从父母、长者或权贵的权威。家中父母为主,学校老师为尊。父母尤其是父亲,不应表露感情,不应与子女玩耍,不应与子女平等。父母面孔威严,不许子女诘问,更不准子女争辩。此外,在传统的华人家庭中,没有个人的空间。家人如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个人行为皆被视为对家庭非荣即损,因而不能轻举妄动。华人父母教养子女的目的是光宗耀祖。

#### 1. 代际冲突的具体表现

华人移民家庭有点像“高压锅”。锅内的代际冲突,日积月累,有时平静,有时沸腾,偶尔爆发。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如教育、工作态度、消费行为及男

女约会等常常会引起激烈的冲突。

第一个敏感的问题是教育。华人家庭养儿育女最重要的是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下的华人父母,常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很高的要求。美国家庭多奉行“学而优则上”,量力而为的哲学。但华人家庭强调教育的独特之处,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还要为父母争面子。子女学有所成是为父母增光,为家增光。因此,父母不断提醒子女读好书是对父母和家庭应尽的义务责任。如果子女读不好书,家里就没面子。所以,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争取好成绩。同样,父母也为子女学业和成绩承受巨大的压力。原因是亲友同事之间为子女攀比的情况比比皆是。

移民父母到了美国也对教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深知自身的局限性,如财力、社会资源等十分有限,无法打入主流社会经济,无法打入主流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因种族歧视和移民身份无法进入某些高薪行业。他们明白,子女攻读下列的学科是日后出人头地的可靠捷径:数、理、化、工(程)、医、商、法(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只重视子女所修的课程是否实用,学习成绩是否拔尖,而不重视子女的学习过程及课外社会活动。父母还替子女选读父母所认定的有用课程和专业,而不考虑子女的兴趣爱好,并力阻子女主修历史、文学、音乐、舞蹈、体育和任何其他无法导致高薪稳定职业的专业。虽然子女可以理解父母的苦心孤诣,但他们十分不满父母代替他们选专业或选学校,代替他们做重大的决定。

第二个敏感的问题是“读书之道”。移民父母深信刻苦的工作态度是读书成功之道,而非靠所谓能力或智慧。许多华人父母,无论地位高低,都坚信只要子女刻苦用功,就一定门门满分。如果子女没拿满分,那一定是不够勤奋刻苦所致。移民父母还深信勤能补拙,认为只要花数倍的努力,就能够克服移民和少数族裔面临的社会结构性逆境和歧视等障碍。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但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子女的分数,任何低于满分的分数都会令他们失望。父母不明白学校的现实:好学生不一定门门功课都得满分。每个学生的英文程度,学业基础并非十分整齐,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也并非那么融洽。许多华人父母缺席学校家长会,认为不应插手干预学校的教育。华人子女经常发现自己虽然比美国同学更为勤奋刻苦,但家长还是认为不够努力用功。

第三个敏感问题是“节俭”。华人移民父母强调储蓄是合理使用家庭财力的手段。他们经常拒绝子女乱花钱和炫耀消费,认为花钱买名牌服装,豪华物

品以及做流行发型为不良行为,过分奢侈;“过于美国化”。然而,这些父母认为只要是对子女有益的,如书籍、电脑、电脑软件、中文课、私人家教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课外文艺体育活动等,则认为花得其所,从不吝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子女,也是为了实现自己望子女成才的期望。

第四个敏感问题是“交友谈恋爱”,尤其是年幼子女的交友。华人父母认为中学生交异性朋友是浪费时间,影响读书,道德败坏,行为不检(尤其是女孩)。但华人父母对高中子女交友有时态度暧昧。“族际交友(交非华裔的亲密朋友)比‘年幼交友’更令华人父母惊恐。父母最怕年幼女儿未婚先孕,而非害怕少年出轨的行为。

随着子女迅速融入美国文化,父母子女间对这些敏感问题的不同见解成为两代冲突的根源。在许多华人移民家庭里,父母子女双方时常怨气冲天。在唐人街或华人聚居郊区打工的蓝领阶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行为尤其坚持己见。但他们缺乏时间、耐心、财力和人力来与子女沟通和解。他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打工父母,也是同样处理问题。这类家庭的“压力锅”通常响声不断,压力很大。散居在白人郊区的中产阶级华人父母同样望子成龙,但他们本身教育水准高,家庭殷实,行事更像其他中产阶级美国人。尽管他们同样在子女前途问题上固执己见,他们一般更多自责,更通情达理,对子女更宽容豁达。例如,如果父亲要求孩子在周末做功课,孩子回嘴说“周末没人工作”。居住郊区、周末休息的中产阶级父亲只会一笑置之,让孩子出去和小朋友玩。然而,周末也要打工养家的蓝领父亲则会勃然大怒,勒令子女周末非得乖乖地做功课不可。

## 2. 华人社团组织和华裔社会关系网的作用

华人移民父母对子女的成长要求过高过严,常常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因而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子女反叛,逃学退学,离家躲避以至加入帮派的现象虽不普遍,但亦令人担忧。甚至优秀生和孝顺的子女有时也会反叛父母。一位高中生说:“成绩再好也无用。老妈总会挑刺,总是不满意”。这话反应了许多华人青少年的不满情绪。

中美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加上美国流行文化美化了自我放纵和助长青少年反叛,严重损害了华人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尽管如此,大多数华人移民子女,无论贫富,大都众望所归,成龙成凤。最引人注目是教育领域。华人移民子女大大领先于包括白人在内的其他族裔的子女。华裔学生各门标准考试的平均分数很高,入读名校的比例极高,地区全国大赛得奖的比例亦极高。他们年年名列最著名的

“西屋科技天才奖”(现为英特尔科技天才奖)的前列。我所在的洛杉矶加州大学,过去几年华裔学生占全校新生总人数的18%,超过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新生的总和。

华裔学生学业成绩的出类拔萃,是否应归功于华人父母以孔孟之道严加管教?对此尚无定论。但更为直接的问题是:在充满两代冲突的华人移民家庭中,华人父母如何行使父母权威及实施儒家之教?为何华人子女最终能不负家庭之望而成才?根据我对华人移民社区的研究发现,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华人社区特定的族裔环境和超阶级的华裔社会关系网。

华人社区(不论是老唐人街或新华人聚居区)对子女教育有利的特定族裔环境,体现在其种类繁多、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华人社团组织。随着唐人街从“单身汉社会”变为以家庭为主的族裔社区,华人社团组织亦随之变化,服务于华人家庭和子女。对子女教育有直接关系的华人社团组织包括中文学校、各类补习班(课后补习班、英文补习班、数理化补习班、升学补习班、高考补习班等)、音乐班、舞蹈班、体育班等。中文学校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非营利性华人社团组织之一。现在的中文学校与过去的不同,不再以教学中文为唯一的目标,而更加重视华人子女教育的全面发展。以纽约市唐人街的中文学校为例,这所中文学校历史悠久,为中华公所所办,是全国各地唐人街中最大的华人儿童青少年机构之一。该校每年(不包括暑期)招收近4000人次的华裔子弟,从幼儿园儿童到高中三年级学生都有。每年开设近140门普通课程,加上10多个专业班(如交响乐、合唱、钢琴、大提琴、小提琴、舞蹈、国画、插花、象棋、围棋、太极拳、武术等)。星期一至星期五课时为下午放学后三点至六点半。一小时做功课,两小时学中文或其他文体课程。该校也有英文班,专收移民子女和成年移民工人,帮助他们学英语。

随着华人散居郊外,中文学校亦开到郊外。20世纪90年代,全美有600多间中文学校,其中大多在郊外。超过1/4集中在加州,在校学生为80多万人<sup>[12]</sup>。就读中文学校,大大加强了华人移民子女的华裔认同感。上中文学校几乎是所有华人子弟的共同经历。在一次问卷访谈中问道:“你认为什么样的经历是典型的美国华裔小孩的共同经历?”许多华人学生答道:“上中文学校”。在中文学校里,华人子女有机会接触其他华人小孩。他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和父母都差不多,都跟一般美国人的家庭和父母不同。结果逐渐使他们承认和适应这种差异。如同一项研究发现:当纽约唐人街和其他唐人街的

华人孩子聚集在一起时,中美文化的冲突感便会大为减少,因大家都是处与同一族裔环境,同病相怜。华人孩子在一起,有利于熟悉和适应华人文化和习惯,使华人习俗和传统受到尊重和容忍。反之,若华人孩子在白人或其他族裔的环境中,便会感到孤独,怨恨自己的父母和族裔文化<sup>[10]</sup>。

由此可见,华人子女通过参与华人社团组织,如中文学校的活动,增加了他们与其他华人子弟相聚和交往的频率,也扩大了他们自己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网。但也有华人子弟利用这些机会来钻空子。例如,某女孩告诉父亲要与中文学校的某华人男生出去活动,父亲认识该男生,就答应了。然而,那女孩实际上是悄悄与其白人男友去约会。事前通知中文学校那男生:如老爸打电话来询问,请代为撒谎。父母通常信任子女在中文学校的同学,因为那些同学的父母也是华人。

此外,中文学校已成为华人父母的聚会处,尤其是住在郊外的华人移民。譬如,郊区的中文学校大多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周末上课,并需要华人父母的义务帮助。这样一来,每到周末,华人父母送了子女去上课,他们就自动组织起来,协助学校做行政工作。有的父母还义务担任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他们还自己组织各种活动如召开各类研讨会以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等。由此,郊区的周末中文学校成了华人社交组织,学生父母在此交往。在一次调查采访中,某华人家长把中文学校比作教堂,说:“我们不信教,不去教堂。所以,每周来中文学校一次,就像上教堂一样。孩子们上课时,我们就参加自己组织的活动,如学跳舞蹈,练健身操,讨论股票市场行情、财务、子女教育方法以及子女升大学等。每周我都渴望星期六去中文学校,因为这也是我与其他华人用汉语交流的唯一机会。我知道我的几个大孩子都不大乐意上中文学校。他们对我埋怨时,我就告诉他们:不去也得去。”在中文学校,父母们互相交往,也编织了一个有利的社会关系网,通过这种社区组织的参与,交流教子经验,共商教子大计。

总而言之,华人社团组织的作用在教育年青一代中不可或缺。华人社团组织为华人子女提供了一个课后去处,提供了一处安全、健康和有趣的环境。中文学校和其他课后班促使青少年做功课和参与其他有益活动,阻止他们流落街头或呆在电视机前,从而大大减少了上班父母的担忧和操心。此外,此类华人社团组织亦为华人青少年提供了交流机会。某中文学校教师指出:“让年轻人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自由表达极为重要。华人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很高。当子女无法达到这种要求又无处表达自己的焦

虑时,他们就可能与父母疏远而流落街头”。

华人社团组织亦成为封闭的华人世界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桥梁。居住在唐人街和华人社区的华人移民父母及子女大都与世隔绝,与美国主流社会甚少联系。许多打工族父母,既期望子女读好书找好工作,又缺乏帮助子女的良方。华人社团组织填补了这项空白,使华人青少年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帮助他们寻求打入主流社会、出人头地的道路,不再终身屈居唐人街。课后班、补习班、预考班在唐人街随处可见,使课后补习蔚然成风。某教师指出:“看看华人孩子课后补习这样积极,他们学业上出类拔萃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华人社团组织亦是中华文化的中心,使华人道德传统和民族骄傲发扬光大。课后补习班或中文班中,美国本土土生的华裔孩子虽然彼此讲英语,每天所学的汉字有限,但他们在此能学到在美国学校学不到的东西。包括听汉语故事,唱汉语歌曲,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等,不会因语言文化的独特而遭到嘲讽。孩子们学写汉字,如:“我是华人”、“我的祖国是中国”等。还读唐诗宋词,背孔孟名言,从中了解中华家庭价值观,处世准则,道德规范和读书的重要性。某中文学校校长指出:“学生来这里是受父母所督促。他们其实对学中文兴趣不太大,我们也不强求他们。教汉语只是我们的手段之一。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教孩子们不要忘本,教他们尊敬父母,以身为华人为荣”。

华人社团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各类各阶层的华人移民提供了许多交流的机会<sup>[13]</sup>。在华人社区工作、购物和交友,使华人移民形成了密切的社会关系网。华人移民社区中的社会关系网,加强了对华人行为准则的认同,并规范了关系网成员的行为。子女参加华人社团组织活动也缓和了来自父母的压力。华人社会提供的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帮助,在许多方面都行之有效。在华人社会中,父母的压力和代际冲突,变成了使孩子们努力的动力。孩子们受到鼓励刻苦读书,力争优秀,因为他们明白读书是日后出人头地、独立自主的唯一途径。父母的压力和华人社团组织的促进,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某华人社区青少年活动主管指出:“当然,对孩子施加压力可能引起日后的麻烦。但大家要知道,我们并非身处世外桃源。即使不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也一样会在家里反叛。这样可能会使更多的孩子读书不及格,考不上好学校。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使这些孩子通通考上大学。我们在这方面非常成功。”

#### 四、结语

在美国,许多华人移民家庭期望子女进入名校,

品学兼优,最终获取高学位和高薪稳定的职业。这样就能挤进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光宗耀祖,为家争光。子女如果不争气,则会使全家蒙羞,父母脸上无光。应该指出,华人移民的父母在家对子女实施的这些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并不容易,望子成龙亦非易事。原因是大部分移民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子女成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复杂,且两代人的同化速度不一致,代沟很深,代际冲突也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及子女双方都需要处理好家庭与代际关系,互相妥协,解决冲突,找出代价较小而能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成功非靠个人努力或一家之力所能及,必须依靠华人社区组织的力量,依靠华人社区的组织和关系网的引导和支持。当今的华人社区及其各类社团组织跟过去的大不相同。它们不仅为新移民的基本生计提供帮助,还致力于帮助华人移民和第二代打入美国主流社会。有组织有能力的华人社区力量,不仅体现在“有形”的中文学校,课外补习班,青少年文艺体育和社会技能班,大学预备班等,还体现在新形成或重新建立的、越来越强的无形社会关系网,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直接的服务,也促进对他们的管教和约束。

作为研究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的社会学家,我认为,每个族裔群体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非生来俱来,一成不变,而是环境的产物,并且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更。移民在接收国的顺境和逆境,移民对接收国的态度以及接收国对移民的政策和主流社会对移民的态度等,都对移民及其家庭的社会适应和向上社会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移民家庭本身必须依靠族裔社区的道义性和实质性的支持。因此,从文化与环境、个人与组织的互动角度来研究移民家庭是有益的。该研究角度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密切关注移民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不同角色的变更以及华人社团组织机构的中介角色的作用。从中可以发现移民子女读书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成功之路受制于环境,尤其是独特的并与移民家庭关系密切的族裔社区环境。

事实上,当今华裔第二代的青少年大多能够刻苦上进,学业成绩拔尖,在各大名校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中华文化传统的注重教育,提倡孝顺,好学,刻苦,自律等美德,的确有助于华人移民的子女学有所成。华人子女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进了大学后的处境则鲜为人知。许多华人父母极为关注子女能否学业全优,考上名校,极为在意自己所付出的牺牲能否在子女身上得到相应的回报,但却很少看到并关心子女成功的背后所必

须得付出的代价。根据笔者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校园里的观察:华人子女一旦进了父母所期望的名校,他们就与其他族裔的学生一样,从学习到生活的一切只能靠自己个人的努力,而再无家庭或族裔社团的帮助,亦无一致的行动准则和目标指南。有些华裔学生因为从小缺乏锻炼,事事由父母和社区组织安排妥当,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强,上大学后又要独自去面对新的环境,应付沉重的学业和激烈的竞争,结果往往不知所措,变得孤僻,甚至精神崩溃。因此,研究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不仅应该注重结果,也应注重成长过程。尤其要特别重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培养他们的应变和适应能力,在既有充分的自由、又有激烈竞争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求上进,使之不断地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 1 ] CHAN S. Asian Americans :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M ]. New York : Twayne Publishers ,1991 .
- [ 2 ] SAXTON A.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M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 [ 3 ] ZHOU Min.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M ].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 [ 4 ] LI Wei.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a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from chinatown to Chinese ethnoburb in Los Angeles[ D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7 .
- [ 5 ] ALEJANDRO P ,ZHOU Mi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

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J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 ( 11 ) :74-96 .

- [ 6 ] HOM C C.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ractices of Chinese immigrant youth and parachute kids[ M ]//JENNIFER L ,ZHOU Min. Asian American youth :culture ,identity ,and ethnicity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43-158 .
- [ 7 ] KAREN P ,DANG T. “ FOB ” and “ whitewashed ” :identity and internalized racism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s [ J ].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3( 26 ) :147-172 .
- [ 8 ] GANS H J. Second-generation decline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 1965 American immigrants [ J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2 ,15( 2 ) :173-192 .
- [ 9 ] ZHOU Min. Social capital in chinatown :the role of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nd families in the adapt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 ]//LOIS W ,MAXINE S S ,BEYOND B W. New voices ,new f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hools .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181-206 .
- [ 10 ] SUNG B L. The adjust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New York City[ M ]. New York :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1987 .
- [ 11 ] DION K L , DION K K. Chinese adaptation to foreign cultures [ M ]//BOND M H.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7-478 .
- [ 12 ] WANG Xue-ying. A view from withi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heritage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R ]. Washington DC :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 1996 .
- [ 13 ] 周敏.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J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 4 ) :24-31 .

(上接第16页)是要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按其当时的观点,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sup>[7]</sup>此时马克思的哲学只不过是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一种变种,在整个理论根基上仍没有逃离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问题域。

最后,此时马克思所开出的实现自由的药方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为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不去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哪怕是喊上一千遍、一万遍的自由口号,都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只有推翻旧有的社会关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迎来自由的曙光,而这点恰恰是马克思后来才意识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时的自由只不过是悬在空中的楼阁,可望而不可即。

### 参考文献:

- [ 1 ] 埃朗格英·陶贝尔特.《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第一部分 [ M ]//中央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52 .
- [ 2 ] 许启贤.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论纲(一)[ J ]. 道德与文明 ,1993( 5 ) :30-32 .
- [ 3 ] 王强.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真正意图与意义[ J ]. 辽宁高等教育研究 ,1993( 5 ) :126-128 .
- [ 4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 [ 5 ] 梅林. 马克思传[ M ]. 樊集,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3 .
- [ 6 ] 丛大川. 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J ]. 洛阳师专学报 ,1993( 3 ) :5-10 .
- [ 7 ] 列宁. 列宁全集:第26卷[ 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48 .